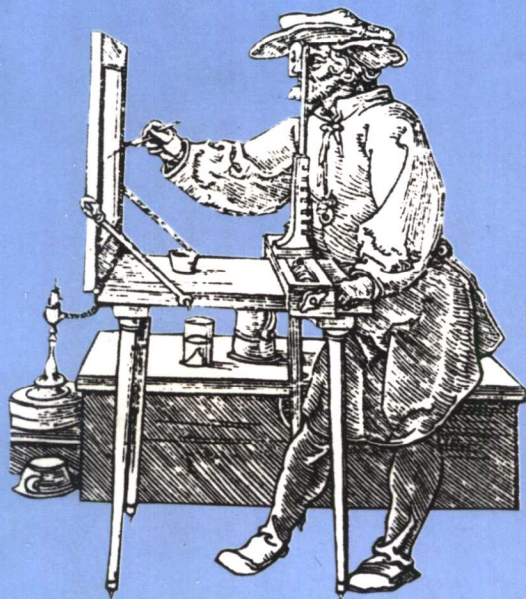


LIFE AND TIMES OF REMBRANDT

房龙 作品集

伦勃朗的最后岁月 (上)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LIFE AND TIMES OF REMBRANDT

房龙 作品集

伦勃朗的最后岁月 (下)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伦勃朗的最后岁月

房龙 作品集

**LIFE
AND
TIMES
OF
REMBRANDT**

ISBN 7-80609-648-5



9 787806 096482 >

K83

房龙作品集

蔡玉洗 寒 奇 主编 谷雨工作室 策划

伦勃朗的最后岁月

[荷兰]J. 房龙 原著

[美]H. W. 房龙 改写

俞洪亮 季亚琴 汤永明 潘志明 姚峰 译

(上)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0337142

房龙作品集

蔡玉洗 寒 奇 主编 谷雨工作室 策划

伦勃朗的最后岁月

[荷兰]J. 房龙 原著

[美]H. W. 房龙 改写

俞洪亮 季亚琴 汤永明 潘志明 姚峰 译

(下)



大学图书馆藏书

1<835.635.7/2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48

琼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 邱禹

·房龙作品集·

伦勃朗的最后岁月

[荷兰]J. 房龙 原著

[美]H.W. 房龙 改写

俞洪亮 季亚琴 等译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发行
(海南省海口市海府一横路华宇大厦)

电话:0898-5371270
安徽省南陵县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开本 32 印张 24.5

印数 1—10000 册

1998 年 3 月第一版 1998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609-648-5/Z·13

定价: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编 者 的 话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 1882年生于荷兰鹿特丹一个富有家庭,但房龙的父亲很少顾及他,自小父子分居,养成房龙喜欢独处的性格。从十岁起房龙沉溺于众多的历史书籍之中。他对历史的了解远胜于自己生活的二十世纪。房龙一生漂泊,阅历丰富,知识渊博;为了历练人生,几乎走遍西欧各国,当过教师、编辑、记者,后来移居美国。虽然他曾留学德、法、美,获得博士学位,但他并没有关进书斋,进行专门学问的研究。他说:“凡学问一到穿上专家的拖鞋,躲进了它的‘精舍’,而把它的鞋子上泥土的肥料抖去的时候,它就宣布了自己预备死了,与人隔绝的知识生活是引到毁灭去的。”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房龙一生都在探索写作、传播知识、学问与普通民众的结合途径。但凡阅读过房龙著作的人都得出共同的结论:他的文笔是为青年和少年的,但作品中的深邃思想和先进观念却是为成人的。他早期受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莫斯的影响很大,一生反对愚昧和偏执,对普通民众充满同情。二十年代开始写作通俗历史著作,到1946年逝世为止创作了几十部著作,所涉及的范围从宇宙开始到二十世纪,除了众多的人物传记外主要集中在人类历史、文化、文明、科学发展进程的宏观把握上。

这次我们选译的四本书可以说是房龙的代表作。《古代人——人类文明的起源》(《ANCIENT MAN - THE BEGINNING OF CIVILIZATIONS》)出版于1923年,《人类的故事》(《THE STORY OF MANKIND》)出版于1929年,《发明的故事——人,奇迹的创造者》(《THE STORY OF INVENTION - MAN, THE MIRACLE MAKER》)出版于1928年,这三部书分别代表房龙对人类历史、文明进化和科学发展的观念。解放前这三部书都有中文译本,很多老一辈文化人对这三部书都有很深的印象。八十年代以来,国内以三联书店为代表相继把房龙先生的多部著作介绍过来,《人类的故事》、《漫话圣经》(《THE STORY OF THE BIBLE》)、《宽容》(《TOLERANCE》)对青年读者产生过广泛影响,但至今未见《发明的故事》出版(三联版《发明的故事》厚厚两本不是房龙先生所著),就我个人意见,三联版《发明的故事》内容丰富,但文笔不及房龙先生。这次我们编选文集时还收入房龙先生改写的一部传记《伦勃朗的最后岁月》(《THE LAST YEARS OF REMBRANDT》),这部传记是房龙先生的远祖乔安尼斯·房龙医生所著,后被房龙先生发现,经房龙先生改写整理多次。我们选这部传记是出于以下考虑:一是乔·房龙医生是画家伦勃朗的挚友和医生,对这位艺术大师的高尚人格和艺术风格敬佩备至,这部传记是他亲身经历,真实地记录了一个艺术大师的晚年生活。二是房龙先生对于艺术大师生活的十七世纪历史相当熟悉,自己也写过很多有关十七世纪历史人物的传记,房龙先生对他这位远房先祖的传记多次改写整理,倾注了他自己的文学观念,也能代表他对传记文学的独到见解。三是这部传记国内目前尚未见完整译本,对于研究伦勃朗的创作是非常可贵的资料。

八十年代初,房龙的《宽容》由三联书店出版,立刻成为一本畅销书。在这之前,读书界很少知道房龙这个人。《宽容》一出

才知道房龙在旧中国也曾风靡过一阵子，著名作家郁达夫、林徽音、历史学家曹聚仁都对房龙的书评价甚高，不是赞扬他的文笔有“魔力”，就是对他的构思和表达方式深表佩服。曹聚仁先生在《我与我的世界》这部回忆录中讲到第一次读到房龙《人类的故事》时这样写道：“那天下午，我发痴似的，把这部史话读下去，车来了，在车上读；到了家中，把晚饭吞下去，就靠在床上读，一直读到天明，走马看花地总算看完了。”曹先生当年的入迷程度可见一斑。这种现象在我们的读书生活中也可能因某本小说或畅销书而出现，但曹先生对《人类的故事》的痴迷不是一阵子的事，而是再三复读，持续几十年。他说：“这五十年中，总是看了又看，除了《儒林外史》、《红楼梦》，没有其他的书这么吸引我了。我还立志要写一部《东方的人类故事》。岁月迫人，看来是写不成了；但房龙对我的影响真的比王船山、章实斋还深远呢！”才女作家林徽音译《古代人》也不是随便选一本书信手就译的，她喜爱房龙的文笔、喜爱房龙用文学的笔调来写科学的故事。译好后请大作家郁达夫先生为之作序，达夫先生写道：“房龙的方法实在巧妙不过，干燥无味的科学常识，经他那么的一写，无论大人小孩，读他书的人，都觉得娓娓忘倦了。”

“房龙的笔，有这么一种魔力，但这也不是他的特创，这不过是文学家的手法，拿来用以讲述科学而已。”

我想有这三位作家谈或译房龙先生的书，已经向读者宣示了房龙先生作品的价值，本不需要我再说什么话了，但我总觉得房龙先生作品的魅力除了用文学笔调来讲述科学常识之外还有更深一层意思，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大家知道，房龙先生在中国很被冷落了一阵子，除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因素之外，我想还有另外的原因。即使在欧美诸国很多人也并不把房龙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文学家来看待。因为

房龙确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他写的几部有关历史的书虽然有历史依据，但并不是标准的历史书籍，而是一种对已有历史事实的通俗阐释，他的目的并不在于对于历史事实的考证和发现上，而是在对现成历史事实的普及和大众化上；他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家，他的文笔虽然优雅，写的却不是小说、诗歌，只是对历史事实、科学发现、人类文明历程的文学性叙述，所以历史学家嫌他没有发现什么历史事实，填补什么空白；文学家嫌他文学的创造性不够，不承认他的文学家地位。

我在仔细阅读了房龙的作品之后，觉得国内外对房龙先生作品的评价是错用了标准，忽视了房龙先生作为一个人类文化和科学文明发展进程的大众启蒙者的价值。他要让历史学家的历史变成大众的“历史”，要让文学作为一种工具，成为大众长智慧学科学的钥匙。通过房龙的文笔，枯燥的历史变成活泼、引人入胜的美文。房龙的书在欧美青少年中受到广泛欢迎，就是因为青少年通过阅读房龙的书不费多少脑筋就可以对人类的历史知识、文学科学发展的规律有一个较为系统连贯的了解。这对于青少年来说，不管今后从事什么工作，无论是普通劳动者，还是从事某种专门学问的研究，都会受益无穷。房龙的书只是作为一个文明社会公民的素质基础读本而体现了它的认识审美价值。

房龙在《宽容》这本书的序言中对于他的文化启蒙用心作了非常明确的说明：在宁静的“无知山谷”里，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对于生活在这“无知山谷”的人们，发源于荒山的“知识小溪”就够了，“守旧老人们”叨唠着古怪的字眼，深夜，在小镇的狭窄街巷里，人们低声讲述着情节模糊的往事，讲述那些敢于提出问题的男男女女，这些男男女女后来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另一些人曾试图攀登挡住太阳的岩石高墙。但他们陈尸石崖脚下，白

骨累累。日月流逝，年复一年。在宁静的无知山谷里，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终于有一天，在一个漆黑的夜里，一个人爬回了无知山谷，敲响了草房的门。

但这个漫游者的命运是个悲剧，尽管他向守旧老人和昔日与他志同道合的人恳求到：“听我说，大家都高兴起来吧！我刚从山的那边来，我的脚踏上了新鲜的土地，我的手感觉到了其他民族的抚摸，我的眼睛看到了奇妙的景象。”“那边的山上有牧场，牧草同样肥沃，男男女女有同样的血肉，城市是经过一千年能工巧匠细心雕琢的，光彩夺目，我已经找到一条能通往更美好的家园的大道，我已经看到幸福生活的曙光。跟我来吧，我带领你们奔向那里。上帝的笑容不只是在这儿，也在其它地方。”

可守旧老人不听他的话，认为这是“对神圣的亵渎”，宣布他“死有余辜”。

人们举起了沉重的石块，砸死了这个“漫游者”。人们把他的尸体扔到山崖脚下，借以警告敢于怀疑祖先智慧的人，杀一儆百。

但没过多久，爆发了一场特大干旱，“无知山谷”里的人们无法活下去，叛乱终于发生。守旧老人已无力抗争强大的追求幸福的人流。更多的人踏上了当年漫游者的道路。

他们找到新的世界，新的乐园，漫游者的尸首已荡然无存，他们只能在石头上镌刻先驱者的名字，一个首先向未知世界的黑暗和恐怖挑战的人的名字，他把人们引向了新的自由。

房龙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漫游者”，他在人类历史、文明、科学的发展进程中不倦地向“无知山谷”输送泉水，让荒芜的沙漠能开放出鲜艳的花朵。他对漫游者命运的同情和肯定使我想起了西方文化中的普罗米修斯形象，中国的鲁迅先生也曾愤激地要把在黑屋子里酣睡的人们唤醒。房龙先生的作品长期在人们

的心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并不是单单因为它通俗,也不是单单因为它文学的叙述笔调,更重要的是他的文明和科学先驱者的角色定位,他要告诉人们的首先是“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类应该如何认识自己、发展自己,在人类与自然、与文化、与科学发明的诸种关系中,人类的根本价值观是什么,这些根本东西搞清楚了,人们才能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一个自为、自由的人,享受文明科学的成果,同时自觉地参与文明、科学成果的创造,为文明的更深更高发展提供宽容宽松的人文环境。这种先驱者的启蒙角色是房龙作品魅力的根本所在,它的通俗、它的文学性都是为这个根本目的服务的。

今天我们来翻译、推荐房龙先生的作品,一方面是房龙先生作品的内容有益于我们,另一方面是房龙先生创作这些作品的方法和思维方式。因为文明和科学的发展终会使房龙先生作品的部分内容不再新鲜,但房龙先生构思作品的方法和思维方式以及他对大众文明和科学发展的启蒙意识永远会启示我们。

现在不少青年学者写起论文来,新名词吓死人,新概念满天飞,搞得只有他自己知道说什么,专门家搞不懂,更不要说普通大众了。房龙的思维方式和写作艺术值得借鉴。如果我们能把很多新科学、新发现,用房龙式的文笔、房龙式的思维告诉大众,让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也知道多媒体、信息高速公路、智能化大楼、航天飞机、空间站、仿生技术等,这对于中华民族大众素质的提高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希望能有中国自己的房龙出现,而且不止一个。

蔡玉洗

1998年1月25日

译者序

“在一块湮没无闻的墓地举行的葬礼——半开的棺材，尸骨被挪走，扔到了垃圾堆里……直至今日，依旧是未偿清债务的破产者……如在世时一样。”这就是十七世纪荷兰最伟大的现实主义画家、十七世纪欧洲文化艺术的杰出代表伦勃朗·哈门斯·范·莱因的悲惨结局。在他的一生中，尽管屡遭坎坷，然而生活上的磨难并没有摧毁其意志，也未能阻遏其创作的热情。相反，随着境遇的变化，他给世人留下了数以千百计的油画、版画和速写作品，大大丰富了世界文化艺术的宝库。

伦勃朗生活在独立后不久的尼德兰七联省共和国，当时的荷兰无论在经济活动，还是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进入了空前未有的黄金世纪。但谈及荷兰的黄金世纪，人们的脑海中不能不首先想到那些不朽的艺术形象以及创造它们的艺术家。如肖像画大师弗兰斯·哈尔斯，他特别善于刻画不同的笑脸，到了呼之欲出的程度；风俗画家维米尔把窗明几净的屋子、精致的家具、清洁的地板展示在世人的眼前；风景画家鲁伊斯德尔和霍布马以高超的艺术技巧，出色地描绘了荷兰的自然风光；还有奥斯塔德那些充满讽刺意味的画像，……然而，这在众多艺术家之中，伦勃朗则是一颗璀璨的巨星。

十七世纪的欧洲盛行华贵绮丽的艺术思潮，在绘画上追求

色彩艳丽和形式华贵,以服务于教会及宫廷为主,鲁本斯是这一画派的主要代表。荷兰画派则摆脱了宗教和宫廷的束缚,更加广泛地面向市民及世俗生活。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如农民、贫民、鞋匠、金匠、捕鼠人、街头流浪汉等等都跃然于荷兰画家的画布之上。这些多种多样的创作题材都取之于生活本身。该画派的许多作品造型真实、生动而富有诗意,结构精确、严谨而自然,技法娴熟,用色协调、统一、响亮,色块堆得不高;画面具有柔和的空间感和逼真的质感。

同时,艺术品已作为商品进入市场,画家为了招徕顾客,为了生存,不得不迎合那些达官富商的趣味,大肆描绘和渲染小资产阶级那种舒适闲散的生活和小市民趣味,但作品缺乏深刻的思想性。而伦勃朗不求迎合当时资产阶级的趣味,尽管其精神上与物质上的痛苦都达到了极点,但他丝毫不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坚持自己独特的画风。

伦勃朗于1606年出生在莱顿市一个磨坊主之家。1620年,在莱顿大学登记入学,但他却没有真正地听过一次讲座,接近过一位教授。他立志要成为一名画家。不久,他便终止了学业,并拜当地画师贾普·斯旺纳伯齐为师,学了三年。三年后转到阿姆斯特丹,师从著名的历史画家拉斯特曼,从此他便对历史题材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625年,又返回故里莱顿,与年轻的版画家利文斯一起开办了画室,直至1631年之前,他一直勤勉作画,探索、积累艺术经验。在这段时间,卡拉瓦乔的明暗法和哈尔斯的自如奔放的画风已在他的创作中产生了影响。

1632年,伦勃朗移居阿姆斯特丹,开始进入艺术创作的盛期。他的集体肖像画《塔尔普教授的解剖学课》使他一举成名。一时间,订画者络绎不绝,应接不暇,众人拜倒在他的脚下,他成了社会的宠儿。两年后,他与名门闺秀萨斯琪亚成婚,婚后的几

年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如1636年的作品《酒店里的浪荡子》实质上画的就是大师本人及其妻子。这个时期的其它作品有《坐在旋梯上的学者》、《丹娜埃》、《母亲》、《卖鼠药的人》等。

正如梭伦所说:“死亡之前没有快乐。”人生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可伦勃朗所走的人生道路似乎更曲折。1642年,双重的灾难降临到这位画家的头上:首先是他的那幅班宁·库克自卫队的集体肖像画即《夜巡》遭到订货者的拒绝和社会的诽谤;更悲哀的是,他的爱妻萨斯琪亚在此时突然去世,这不仅使他失去了生活上的终身伴侣、艺术上的得力助手,而且致使他与达官名流逐渐失去了联系。从此,订画者日趋减少,门庭冷落。然而,他并没有因精神上的打击和物质上的贫困而改变自己的艺术观点,没有去迎合资产阶级庸俗的艺术趣味。正如他所言:“但愿我不按照他们的方法去感受事物!他们可以让我挨饿,可他们改变不了我的信念:我对,他们不对。”这就显示了画家的伟大人格及其坚定不移的艺术思想。到1649年为止,他用自己开拓的艺术风格画了不少杰作,如《大卫和亚沙龙和解》、《不贞的女人》、《天使降临圣子之家》等等。

1649年,伦勃朗找到了另一个女人,即他的女仆亨德里克琪,但不是作为他的妻子,而是作为他的情妇。因为萨斯琪亚的遗嘱上有一句话:如果他再婚,就失去对他们唯一活着的孩子蒂托斯的监护人资格。这一次的結合尽管遭到了社会上的市民们,尤其是萨斯琪亚的亲属们的诽谤和责难,但第二次的爱情使他在艺术上和生活上得到了莫大的安慰。虽然没有订货,他仍创作了不少优秀作品,如《亨德里克琪像》、《戴金盔的人》、《自画像》等油画,《三个十字架》、《浮士德》等版画。

由于画家与当时荷兰资产阶级的艺术趣味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他的画卖不出去,使他陷入极其贫困的境地。尽管几百

年后的今天,他的画已是价值连城,但在当时,他的画却只值半盾,甚至更低都卖不出去。1656年,破产法庭宣告他破产,其住宅及珍贵的收藏品被廉价拍卖一空,可他仍是一个“未偿清债务的破产者”。之后,在几位好友的帮助下,亨德里克琪和爱子蒂托斯开办了一家艺术品商店,勉强度日。即使在这样的境遇下,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艺术信念,画了一些不朽的名作,如《雅各祝福他的孙子》、《博士来拜》、《使徒保罗》等等。

1661年,伦勃朗在乔安尼斯·房龙医生的极力帮助下,接到了两项定件:一幅是历史画像,即《西维利斯谋叛》;另一幅是《商会的理事们》。虽然这两部巨作在艺术上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但并没有受到公众的注意,因为它们不迎合那些小资产阶级的庸俗趣味,说得更确切些,我们这位大师的艺术思想远远地超前了几百年,他们无法欣赏。就这样,在他有生之年,他成了一个古代的、被人遗忘的大艺术家。

1662年,他忠实的伴侣亨德里克琪病逝。六年后,爱子蒂托斯也匆匆离开了人世。这位心力交瘁的伟大匠师亦于次年悄然长眠。可他至死仍固守自己的艺术思想,希望自己的艺术能在三百年后被世人公认。毕竟,历史是公允的。他去世后一百年,英、法、德、俄等国的一些画家开始受其画风的影响。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伦勃朗的艺术终于得到了世人的普遍承认。

纵观伦勃朗的一生,他自始至终都坚持自己的艺术思想,注重自己对所观察事物的确切感受,如他所说:“居住在荷兰的我们的感受应取源于本国各种常见的题材,而非千里之外的某一题材。”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画家,他的宗教或神话题材的作品完全排除了神圣尊严的观念,他把圣人视作普通的老百姓。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伦勃朗把圣母画成尼德兰农妇的样子,是用尼德兰农妇描绘圣母。”

伦勃朗在光线的运用方面独具匠心。他在作品中经常运用暗的背景,与受光对象形成强烈的对比,给观众既强烈醒目而又和谐统一的印象,构成诗意般的动人境界,法国的保罗·菲欧伦曾说:“他的光出自本人,他的头脑和他的心。它代表心灵、爱情、智慧与感觉,也更胜过于太阳的光芒。”他的这一艺术手法,使西欧的绘画在文艺复兴以后又向前发展了一步。

本书是一部回忆录,原作者是十七世纪阿姆斯特丹一位颇有声望的外科医生乔安尼斯·房龙。乔安尼斯是伦勃朗最忠诚的朋友,他写此书的初衷不过是借以抒发自己内心的愤懑,并没想把它出版公之于众。约三百年后,于1930年,与乔安尼斯相隔九代的玄孙、以一部《宽容》名闻天下的亨德里克·威廉·房龙在先祖的遗产中发现了这部书稿,便作了细致的整理并加写了尾声,在美国首次公开发表。

本书共八十章,另加前言及尾声,约五十余万字。作者较为详尽地叙述了伦勃朗最后近三十年的生活历程、一些名作的创作过程以及他所持的一些艺术观点。要确切了解、深入研究伦勃朗,本书是可以凭借的重要的第一手材料。除此之外,作者还向我们展现了伦勃朗时代的社会风貌,如英、荷为争夺殖民地而引发的战争、强大的船队带来的商业繁荣、官吏的阔绰、商人的豪富、老百姓的贫困等等逐一展现在我们的眼前。那些资产者的利己主义、庸俗无知,以及教会的荒谬和不公允使荷兰的不少思想家、学者和艺术家在一贫如洗之中衰落。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在十七世纪以后荷兰文化衰落的原因。